

# 蒙古语地名研究概述

哈丹朝鲁

蒙古民族,在历史上有过多次的大范围的移动,因而蒙古语地名广泛分布在我国东北、华北、西北等地区,成为我国地理上、地图上重要的组成部分。研究蒙古语地名的分布、演变、结构、含义及其汉字译音和罗马化的问题,对于增进人们更好的了解蒙古民族的历史变迁和他们所居住地区的地理环境等有着重要的意义。蒙古语地名,在各种史籍、方志、地理著作和文学著作等涉及到。

记录蒙古语地名最早最多的莫过于《蒙古秘史》。《蒙古秘史》,是蒙古人最早用畏吾儿蒙古文撰写的一部宏伟的蒙古族历史巨著和古典文学作品。该巨著中有 170 余条蒙古语地名。《蒙古秘史》的音译者,用汉字音译蒙古语地名(包括其它词汇)时,采用汉字的偏旁部首或字旁小注相应汉字的方法弥补了音译汉字拙于表音和表意的缺陷。根据内蒙古师范大学巴雅尔教授的研究成果,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音译时一部分词采用了即注音,又示义,音义并举的科学方法。即水名尽量采用带水的汉字,山名量采用带山的汉字;2、字的左上角小注“中”字的办法表示喉内音;3、字的左上角小注“舌”字的办法表示舌头音;4、字的右下角小注“黑”、“克”、“惕”字表示急读带过音;5、字的右下角小注“勒”字的扭切法表示两个元音间和词尾的边音;6、字的右下角小注“卜”字表示两个元音间和词尾的双唇塞声“p”;7、字的右下角小注“木”字表示唇音“m”。另外,《蒙古秘史》中有不少一音多字的问题,主要原因是示义的需要。如注蒙古语的“u”音,就用了兀、訢、渥、务、呜、兀等等。其中“兀”为常用字,“务”是地名(河西务)专用字,其它均为示义而用的字。

众所周知,蒙古语和汉语两种语言在语音方面有很大的区别,尤其是,用非音素文字的汉字来音译蒙古语语音的同时还要示义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蒙古秘史》的音译者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尝试,尽量做到即注音,又示义,音义并举,创造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奇迹。

火原洁和马沙亦黑编类《华夷译语》时,在用字、喉内音、舌头音、急读带过音等方面参考过《蒙古秘史》的拼写法,吸收了很多有益的经验,甚至照搬。不同的是《华夷译语》采取了只注音,而不示义的音译法,避免了《蒙古秘史》即注音,又示义而带来的诸多僻字。但是,对语音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导致了诸多一音多字的缺陷和疏忽。这种现象的出现,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统一的音译规范所致,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不可避免的。

鄂尔多斯部萨囊彻辰著的《蒙古源流》,成书于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年),清乾隆年间译成汉文。该巨著中音译蒙古语地名和蒙古族人名字时采用了词间点黑点的办法,以此解决用汉字音译蒙古语时容易产生音节混淆的问题。其它方面与现行的蒙古语地名汉字译音规则基本相同。只注音,不示义。

这些著作的宗旨在于论史、叙事,而不是专门研究地名

的。尽管如此,这些著作在蒙古语地名的汉字注音、借助汉字的表意功能对蒙古语地名进行示义以及借助特殊符号区分音节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清代及以后的史籍、方志、地理书籍,对蒙古语地名的叙述逐渐多了起来。但是,仍然是以论史、叙事为主。真正系统地研究蒙古语地名,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 20 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末的 30 多年间。尤其是,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各省、自治区陆续设立了地名管理机构、地名委员会、地名办公室等。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地名工作者和研究者对各类地名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和研究,从此系统的地名研究工作开始起步并逐渐有了发展。

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地名研究活动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的全国地名普查。通过此次大规模的地名调查活动,积累了数量浩繁的地名资料,基本摸清了我国地名的历史和现状。我国幅员辽阔,地名浩如烟海。少数民族语地名的数量虽然没有汉语地名那么多,但是,她的分布极广,大多分布在边疆地区。就蒙古语地名而言,她较集中地分布在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甘肃、新疆、青海等省、自治区的蒙古语自治区和蒙古族聚居、散居地区。河北、北京、山西、陕西、宁夏、云南等省、市也有零星的蒙古语地名。蒙古语地名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与各历史时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有密切的联系,并多以自然地理实体和生息条件命名。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蒙古语地名的汉字音译以及意译、拼写等方面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在地名普查中,按照国家有关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的规定,对有问题地名进行了有效的处理。对有损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带有民族歧视,妨碍民族团结性质以及其他违背国家方针、政策的地名都进行了更名处理,数万条蒙古语地名得到了标准化处理或重新命名、更名。地名成果为研究蒙古族的历史、地理、语言、经济、民俗、文化等学科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也为研究蒙古语地名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依据。

从第一次地名普查到现在已有 30 多年了。这期间,蒙古语地名研究同中国其它语言的地名研究一样硕果累累。其中最主要的成果是,蒙古族分布区域的盟、州、市、县地名志(录)陆续出版,95%以上的各类地名被收录其中。就蒙古语地名而言,《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在蒙古语地名的汉字译名、蒙古文、汉语拼音注音、来历含义的考证及表述等方面的准确度和正确率都高于其它省、自治区的地名志(录),在全国民族地区的地名学研究中居领先地位。这部大型地名专著,共分 13 个分册。每个分册以志、录两部分组成。地名志部分选收的每条地名都进行了诠释。地名录部分选收了地名志中的所有地名,并补收了所有自然村和牧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县地名图志对选收的每条地名进行了诠释。各县地名图志编纂过程中对蒙古语地名的语源、来历、含义等做了大量细致的研究。但是,由于该区域的语言成

分复杂,加之许多蒙古语地名的历史久远,研究其语源、来历、含义等有较大的难度,从而留下了不少遗憾。首先,除博乐、博湖等少数县市的地名图志注有托忒蒙古文外,绝大多数县市的蒙古语地名均未标注蒙古文。其次,各县市的地名图志中蒙古语地名的拼音既不是汉字注音,也不完全是音译转写,而是一种不够规范的卫拉特蒙古语音的汉语拼音记音或古蒙古语语音。

黑龙江省地名录,每县一册。蒙古语地名主要分布在省境西南部的杜尔伯特、泰来、肇源、大庆、齐齐哈尔、肇东、肇县、富裕、甘南、拜泉、巴彦等蒙古族聚居或散居的县、市、区。其中,杜尔伯特、泰来、肇源三县较多。县和乡、镇有概况,内容详实。乡镇以下地名以地名录的形式收录,没有释语种、来历含义、历史沿革等。除了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在附录中附有蒙古文字以外,其它县市地名录均没有标注蒙古文字。

吉林省地名录,以地区为单元,共分7册。蒙古语地名主要分布在西部的前郭尔罗斯、镇赉、通榆、大安、双辽、长岭、扶余、梨树、乾安等县市。其中,前郭尔罗斯、镇赉、通榆三县为多。蒙古语地名有本县境内相对位置、人口、建村年代、曾用名等内容。没有标注蒙古文字,也没有释来历含义、历史沿革等。

辽宁省地名录为以汉语拼音顺序排列的合订本,没有出版各县市地名志(录)。蒙古语地名主要分布在西北部的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以及建平、凌源、朝阳、彰武、康平等县市。出版说明中写道:“本书中收录的蒙古语地名的汉语拼音书写,是按照国家关于《少数民族语地名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拼写的。”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大多蒙古语地名并没有按照国家关于《少数民族语地名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中的有关规定拼写,而是注音,或记音,或方音记音,少部分地名的“音译转写”也不够标准,也没有标注蒙古文。

青海省地名录为以汉语拼音顺序排列的合订本,没有出版各县市地名志(录)。从民族文字的标注来看,青海省的蒙古语地名主要分布在海西、海北两州以及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其它如湟源、湟中、大通、共和、同德、兴海、达日、玛多、甘德、乐都、茫崖镇、大柴旦镇也有一些分布。地名录的前言中写道:“为了体现党的民族政策,使少数民族语地名拼写统一准确,本地名录中藏、蒙、维、哈语言地名以藏文、蒙文、维文、哈文为依据,按照国家测绘总局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一九七六年共同修订的《少数民族语地名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进行转写。”蒙古语地名的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比较标准。但是,音译汉字存在一些不规范、容易望文生义的问题。

其它如甘肃、宁夏、北京、河北、山西、陕西等省、市、自治区也有集中或零星的分布着蒙古语地名。但是,由于对这些地名的研究不够深入,导致这些地名逐渐失去本来面目,其功能也被削弱。

上述成果中尽管存在着译音汉字不规范、蒙古文字不齐全、拼音不够标准、释义不够准确等问题,但是,这些成果仍然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和学术价值,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蒙古语地名打下了良好的资料基础。

蒙古语地名的研究,除以上成果外,还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论文。主要有:

1、蒙古语地名理论探讨方面的论文。代表性的论文有:达伦布和的《关于蒙古语地名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之浅见》

(蒙古文);色登那木吉拉的《蒙古语地名被遗忘和曲解之原因分析》(蒙古文);车·图格苏荣、德·达尔吉的《解析“蒙古秘史”中的地名通名》(蒙古文);其·恩和的《由蒙古语地名起源而发的思索》(蒙古文);金峰的《清代蒙古台站通名的产生与命名》;许辑五的《蒙古语地名初探》;左成光的《关于蒙古语地名的演变之管见》;舍冷那木吉拉的《蒙古族地区的鄂博与地名》;铁木的《关于蒙古语地名的词汇、词源小议》;达·浩毕斯嘎拉图的《试论蒙古语地名的汉字转写问题》;哈丹朝鲁的《蒙古语地名罗马化一些问题的商榷》等等。

2、蒙古语地名考证方面的论文。代表性的论文有:格日乐的《“巴尔虎”名称的起源》(蒙古文);普·纳森德力格尔的《“阿拉善”名称的来历之我见》(蒙古文);那·布彦贺喜格的《“巴林”名称考》(蒙古文);巴达拉夫的《额济纳土尔扈特考》(蒙古文);普仁来的《“上都”和“一百零八庙”》;张元明、苏达那木的《海勃湾地名考》;铁木的《蒙古语地名“科尔沁”探源》;特木尔巴图的《“八拜”名称考》;王晴的《克什克腾旗由来探源》;李漪云的《板升考释》;木伦的《“贝尔”名称考》;李玉寿的《阿拉善和硕特旗小考》;纳古单夫的《宁城老窖的产地是巴尔罕,不是八里罕》等等。

3、揭示蒙古语地名历史沿革方面的文章。代表性的文章有:乌·阿玛尔吉尔嘎拉的《呼伦贝尔今昔》(蒙古文);斯琴巴特尔的《乌兰哈达名称的来历及其历史沿革》(蒙古文);玛尼扎布、郝振铎的《内蒙古各盟名称的由来及沿革》;舒振邦的《呼和浩特沿革纪略》;孙秀川的《呼和浩特的兴起、含义与演变》;王龙耿的《包头的变迁与发展》;盖山林的《从清“固伦永安公主圪志”看霍林河名称的沿革》;西贝的《浅谈土默特与蒙古语村名》;吉仁太的《伊克昭盟几个旗县名称的来历》;图孟的《土默特左旗沿革概述》;图门的《从满清至民国初年乌兰察布盟的历史沿革》等等。

4、介绍蒙古语地名方面的文章。代表性的文章有:纳森的《林区新城—根河镇》(蒙古文);希日布的《嘎勒达斯坦音阿尔善》(蒙古文);赵相璧的《呼伦贝尔草原上的明珠—海拉尔》;朝夫的《草原城市—锡林浩特》;常海的《甘珠尔庙》;方纲的《义和他拉——未见典籍的古地名》;纳古单夫、乔吉的《呼伦贝尔》;张久钦的《大板》;卢明辉的《额济纳旗与居延海路闻》;额尔顿巴特尔的《额济纳》;郝风的《西拉木伦河—历史的摇篮》;卓永元的《蒙古语地名反映木兰围场的地理景观》;哈达的《别具风格的山城库伦镇》;史银堂的《塞外名寺美岱召》等等。

5、蒙古语地名传说方面的文章。布和朝鲁的《叫来河名称的起源》(蒙古文);孟和巴雅尔的《雅不赖山》(蒙古文);都嘎尔扎布的《王根沙布台》(蒙古文);纳·布彦贺喜格的《塔玛根昭》(蒙古文);清来的《三地名的传说》(蒙古文);苏勒丰嘎的《昭胡都嘎》(蒙古文);额尔敦的《阿拉腾嘎达孙鄂博与阿拉腾嘎达孙柴达木》(蒙古文);敖勒兑的《七座山的传说》(蒙古文);常海的《阿拉坦额莫勒镇之名称》等等。

这些地名研究成果,在蒙古语地名的起源、演变、语词构成、地名考释、命名规律以及蒙古语地名的汉字译音和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即罗马化)等方面,都发表了颇有价值的见解。当然,有的地名考证和理论观点仍有争议,还有待进一步论证和探讨。尽管如此,这些成果对于蒙古语地名的研究还是奠定了稳固的理论基础。